

0291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张伟良 王宪民

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1991年7月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它传入到迅速传播到最后作为一种科学的形态确立并付诸实践，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一开始就带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息。但这时中国的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故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信息毕竟就这样提出来了。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注意，报刊上开始陆续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但由于受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就使得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很复杂的成份。

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出现了分化和论战。论战的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社会主义学说经过许多先行者和先进人物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冲破重重阻力在中国传播开来了。特别是1921年4月7日《共产党》月刊，刊登出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标志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形态传入中国并开始付诸实践。

综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人选择社会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学说是什么时候，经过那些途径传入中国的？“根据现在看到的文献和材料来看，最早包括开始时的片段接触，不会先于1871年（即巴黎公社出现），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形态传入并且开始付诸实践，则以1921年4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刊载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为标志”。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许多先行者和先进人物“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②才逐步传入中国，并蔚为一股强大无比的思潮。

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它传入到迅速传播到最后作为一种科学的形态确立并付诸实践，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通过对这四个阶段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认识到认识，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一开始就带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息

在经过1840年到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都已发展到异常尖锐的地步。亡国灭种的惨祸仿佛时刻都会降临。这一切使沉睡的中国人开始从梦幻中惊醒。全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追究战争失败的原因，寻找应付事变的出路。出路在哪里？他们的眼光从天朝转向了西方。于是，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和其它社会阶层分子，纷纷到欧美去考察取经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这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已跨过它的上升阶段。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矛盾已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社会主义运动正以空前广阔的规模展开。在有些国家已奠定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政党成为走在这些政党前列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西班牙年轻的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国际政治发展中这些如此突出的社会现象，以致一些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极力维护清朝统治的反动人物，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文章，书籍和所办的刊物中已很难回避这些事实。而那些能够亲自到西方去考察和寻找“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这一点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其中不少人在游历，考察归来后，在所写的文章和著作里，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同情。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进分子之一，王韬于1871年从欧洲考察、游历归来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文章，交由《中国教会新报》、香港《新字日报》发表，其中大量的有关巴黎公社的情况。特别是1873年在此基础上他编辑出版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更以纪实的形式详尽的报道了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四月四日，法京乱党十万众，驾运大炮二百尊，由法京长驱直抵西路。乱党分三路并进，以攻官军，官军亦分道御之。一鼓即作，两军相蹙，乱党势锐气猛，无一不拼命相扑。……“乱党之以女子从军也，殊胜于

男子。其临阵从容，决机猛捷，皆刚健中含婀娜之气。……”“法京乱党自始事以迄卒事，被戮于官军者约十余万、妇女、童稚皆不得免。”③作者，在《普法战纪》中，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业绩虽然深表同情，但他不能脱离剥削阶级立场来对巴黎公社作出正确的理解，而只能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来认识巴黎公社。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巴黎公社毕竟就这样提出来了。

这一时期，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零星、片断信息的重要刊物，是洋务派李鸿章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于1873年创刊的《西国近事汇编》。尽管洋务派李鸿章创办这一刊物时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旨在汇编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近今情况，了解‘夷情’以便更好地维护清朝统治。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做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如前面所提到的国际政治发展中的这些重要动向，《西国近事汇编》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近今情况时，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国际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零星、片断信息。《西国近事汇编》从同治甲戌年（1874年），陆续报道说：“德合众新举议员，党天主教者九十二人，党波兰者十二人。主分裂者四人，主‘欧罗巴大同之议会者’八人”。④“俄礼部以境内近有奸民，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籍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气，是相率而出于乱也，邪说诱民，莫以为甚。”⑤“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来信，谓美有数处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国内有无赖之人为奸徒唆使行凶，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此党人啸聚甚众，恐各省同时发作……。今乱党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人为难。去年工人滋闹，尚无头绪，今有数处‘康密尼人’练演为兵，此种人为教训约束所不及，须用武以制之，或用教会以开导之”。⑥（康密尼人即Communist，是共产主义者一词最初的音译；而“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贫富适均”等则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概括）。上述这些消息，显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报道国际政治发展中的这些重要动向的，但它毕竟使中国人知道了在欧美各国，还有着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理想、另一种社会力量。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初步了解，尽管还是零星片断，尽管很不准确，但在中国思想界还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孕育过程，便是证明。他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时说过，他就是在《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下，方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84年，他“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他“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他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故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信息毕竟就这样提出来了，我们在考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演进时，不应忽视这一历史事实。

二、二十世纪初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观社会主义

历史跨越到二十世纪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注意，报刊上开始陆续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这种状况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使得中国人普遍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救亡”成了天字第一号的、最大的课题。中国人的一切聪明智慧首先用来考察和探索怎样挽救国家

和民族之危亡，这样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开始受到中国人的关注，并愈来愈多的传入中国，因为，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有助于救亡。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1905年前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使得帝国主义商品输入大为减少。同时，各省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也日益发展，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民族资本得到了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也有所发展壮大，中国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亦于是时才有演进的条件。

但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处在自在阶段，还没有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一些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在向国内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时，都只是从各自的立场和政治需要出发，这样必然会给予被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带上各种色彩，特别是封建的，小生产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复杂的成份。

在中国较早接触到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维新变法时，就接触到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零星片断。变法失败后，他们流亡海外接触和了解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在介绍和评议社会主义时，只能以他们原来具有的思想文化来加以理解和诠释，并带上特殊的色彩。康有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接受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相融合，搞了一本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同书》。但他的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只能是“过去的回音”、“未来的恫吓”。梁启超比康有为进了一步。他不仅接触到了其它社会主义，还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内容。他在1902-1903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曾宣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⑦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⑧“社会主义之鼻祖”^⑨他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中还说：近世社会主义者，“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以最专制之集权为经行”^⑩当然，梁启超等人由于脱离不开自己的政治立场，更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力图把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东西混为一谈。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将现代社会主义与王莽的“分田劫假”混为一谈。他甚至说，近世社会主义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逝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⑪但是，必须指出，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虽然曾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名字，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相反的是要抵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例如1903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称马克思主义为“迷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传教”。因此，我们很难把梁启超当作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来看待^⑫。

此间，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创办的周刊《新世纪》，在宣传和介绍无政府主义时，也夹杂着介绍过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他们笔下，多半是被曲解和歪曲了的，谈不上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至于假社会主义之说招摇撞骗的政客江亢虎，1911年8月纠集一批同类人物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⑬和辛亥革命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党”^⑭虽宣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然而绝大多数“党员”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用他本人的话说：“究竟能够了解社会主义的有几人？当鼓吹时只要他入党，晓得这个名词就是好的”，^⑮至于在中国将来是否实行社会主义，他的表白更加露骨“本会除研究学说外，单注重鼓吹二字，至于实行，当别为组织，非本会所有事也”。^⑯这样的“中国社会党”，当然与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时期传播社会主义学说较为突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1909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早于其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和著作，介绍

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自今日视之，欲不宗师而尸视之，其安能也”？并且说明：他写这篇介绍文章的目的是“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①⑦}薄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他在随后写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议者”。当然，由于他本人的思想仍属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者，并且不能超出时代给予的限制，所以在介绍社会主义时，表现了按照资产阶级理论去任意解释和修改。但他对社会主义学说抱着热烈同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那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对中国思想产生的实际影响，就比前面所举的那些人撰写的文章和译著要大得多。

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作系统演进贡献最大者首推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到欧洲的孙中山，一方面，他看到了较之封建中国先进很多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他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呈现出的各种矛盾，正是由于看到了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他在以西方资本主义作为疗救中国的药方同时，又极力访求和把握防止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刚好这时遇到了当时在欧美极为时髦，自称能防止物质进步的利益为地主所吞没，又能刺激生产、增加工农收入，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亨利·乔治的学说，^{①⑧}自然被他所接受了。由于有了这种思想，在1905年7月举行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坚持把“平均地权”列为同盟会四项革命纲领之一。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规定“平均地权”的办法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①⑨}列宁认为：孙中山的这个土地纲领不是“防止”资本主义而是最迅速地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纲领。列宁写道：“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反动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②⑩}孙中山搞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的主张、方案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主观臆想，所以，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无法实现的。

这一时期，由于受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只能从他们当时遇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特别是当时西方书刊的介绍和评议中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这样，就使得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很复杂的成份，既有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而真正接触和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

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中国演进过程中，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当资产阶级兴高彩烈地欢庆胜利，准备“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辛亥革命流产了。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结果只是“去一满州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②⑪}这一切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入绝境，资产阶级要解放中华民族出苦难已经无能为力了。从“欧风美雨”的迷雾和苦闷中走出来的个别先进中国人，开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一条新的解放道路而大胆探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使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曙光。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这对于在1911年辛亥革

命后的混乱情况下，苦苦寻求探索新的出路的中国人，无疑找到了一个新的选择——社会主义。特别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②②}“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1912年至1919年八年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加资本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②③}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形成，到1919年已达二百万人左右，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阶级，这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才成为现实。

这时的中国，如列宁所指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②④}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力图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战胜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拯救人民和国家，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思潮空前活跃，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进步团体和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遍及全国。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主要有：李大钊在北京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组织的“利群书社”，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组织的“励新学会”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刊物。从1919年5月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俄国革命问题的论文，通讯等约一百多篇。1918年底，李大钊和陈独秀合办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同年11月瞿秋白等出版了《新社会》旬刊。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同年9月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杂志。不久，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励新》月刊，阮啸仙在广东创办《新学生社》，彭湃创办《赤心周刊》、《教育潮》，在福建有《闽星》，河南有《心声》，安徽有《芜湖半月刊》，据不完全统计，这时全国各地创办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到四百多种。甚至一些保守刊物和一些反动官僚政客办的报刊杂志，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也不得不包含某些社会主义的内容，扯起“社会主义研究”的旗号。正如时人所说：“比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报章杂志，鼓吹不遗力，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②⑤}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传播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成份构成，随着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逐渐深入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和论战。

首先是，李大钊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进行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他极力推销杜威所鼓吹的庸俗进化论的世界观及历史观，^{②⑥}并嘲讽李大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空

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教训人们不要高谈‘主义’，而要多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李大钊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立即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李大钊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指出要解决一个个社会问题，必须靠多数人共同行动，这就要先宣传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宣传主义和解决具体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

其次是，1920年冬至1921年初，陈独秀、李达等同梁启超、张东逊等进行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梁启超、张东逊把当时西方流行的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奉为至宝，^{②7}鼓吹实业发达了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一方面虚伪地说“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兴”，一方面又说中国产业落后，当前要做的是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之”。他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工人阶级，因此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揭露梁启超、张东逊等鼓吹的伪社会主义，陈独秀、李达等人发表《社会主义批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并非没有工人阶级，中国与欧美只有产业发达程度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穷”的问题，使人民得以过“人的生活”。

再次是，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李大钊等人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欧洲。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曾引起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有刘师复、张继等。到1920年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是黄凌霜、区声白，他们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否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鼓吹建立所谓“无政府主义党”。黄凌霜公开提出“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②8}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部分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占有相当的市场。为了打退无政府主义的进攻，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李大钊等人，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从理论上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陈独秀等人认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能绝对自由，必须服从纪律，因此不赞成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政府，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几次论战初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明辨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真伪，特别是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没有系统学习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在思想上、理论上还不够成熟。邓颖超同志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社员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②9}可见，社会主义当时在中国虽然得到了迅速传播，并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还缺乏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

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形态在中国的最终确立

社会主义学说经过许多先行者和先进人物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冲破重重阻力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干部条件基本具备了。但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也不长。范围也很有限，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建党学说还知之甚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封建社会主义等流派之间的界限。连当时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李达，在1921年6月还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派包括：“正统派社会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修正派社会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既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多数人”（既布尔什维克主义）等五派，他们“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所不同的是“所用手段”。至于中国究竟应采取哪一派的学说，要按照中国的国情决定，“不敢说中国应该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③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先进知识分子呢？可见，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粗浅的，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显然，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创建中国共产党，必然还要再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摸索，甚至可能走曲折的路。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准备。1920年11月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在中国出版，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那些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思想上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它主义流派之间界限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经提到过：这些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③②}1920年11月7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建党准备和传播科学主义的需要，创办了一个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既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刊物之一，它一共出版了六期。刊登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其中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节选）、《俄罗斯的新问题》等。另外还刊登了《第三国际大会的起缘》、《共产党同它的组织》、《列宁的历史》（登有列宁的照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列宁著作一览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特别是1921年4月7日刊登的《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③③}，标志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形态传入中国并开始付诸实践。《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是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但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的封锁，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才传到中国，但一经传入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二十一个条件”的内容概括起来如下：（一）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一律用共产党的名称，并制定一个共产主义纲领。（二）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必须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在实际活动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三）必须揭露和批判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四）必须在工会、合作社

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在农村和军队中，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五）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六）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支持各国特别是民族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党，在党内实行军队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八）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列宁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原则，是对布尔什维克建党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系统阐明。这些“条件”不仅对于防止和清除那些企图钻进共产国际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起到了纯洁组织的作用，而且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党的领袖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具有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建党原则和纲领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实际上帮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解决了在建党的思想条件和阶级基础基本具备了的情况下，寻找以什么方式和手段建党？按着什么组织原则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重大问题。

列宁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在中国传播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产生了。这表明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深刻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中，所阐述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一大”《党纲》规定：“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③“一大”《决议》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还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它党手中的玩物”。④我们从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可以明显的看出，它是在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个条件》的指导下创建并提出来的，是完全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党原则制定的，因而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从而保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由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演进，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形态传入并且开始付诸实践，则以1921年4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刊载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为标志。

综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阶级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绝不是中国人“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或者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结果”，⑤而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① 见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教学与研究》1986年4期。

② 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页。

③ 见王韬《普法战纪》卷12，同治12年癸酉七月（1873年8月）中华印务总局活字版。

④ 见《西国近事汇编》卷一、卷二，同治甲戌年（1874年）。

⑤ （同上）光绪元年（1875年）。

⑥ （同上）光绪3年（1877年）。

⑦ 见梁启超《干涉与放任》1902年10月2日出版《新民从报》。

⑧ 见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1902年10月16日《新民从报》第18号。

⑨ 见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年11—12月《新民从报》第40—43号。

⑩ 见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1903年。

⑪ 见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1903年2月26日《新民从报》第26号。

⑫ 参见刘桂生、钱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载《人民日报》1983年5月25日。

⑬ 1911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

⑭ 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成立。

⑮ 见江亢虎《社会主义之今昔》。

⑯ 见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社会星》第二期，1911年8月。

⑰ 朱执信于《民报》第二号《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为题介绍了拉萨尔的生平，其后未再续。

⑱ 亨利·乔治是19世纪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错误地认为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是人们划分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原因，鼓吹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其办法是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的累进税，妄图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

⑲ 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卷第450页。

⑳ 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7页。

㉑ 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页。

㉒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0页。

㉓ 见严中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㉔ 见列宁《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

㉕ 见《太平洋》二卷六号1920年8月。

㉖ 杜威是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者。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他的学说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

㉗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920年——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

㉘ 见《进化》第二号。

㉙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版第91—92页。

- ③⑩ 见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九卷第2号。
- ③⑪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 ③⑫ 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初为19条，后在讨论通过时，补充为21条。
- ③⑬ 《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1979年6月人民出版社。
- ③⑭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年—1925年），第7—8页。
- ③⑮ 见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